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变迁研究述评

陈益元,李 鹏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的社会变迁,学界集中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和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诸多的成果;但总的来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必须从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整合、研究思路的开阔、研究视角的转变和研究内容的展开诸方面进行深化和拓展。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6)04-0095-05

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s of Rural Areas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New China

CHEN Yiyuan, LI Peng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About the social changes of rural areas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new China, academic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the aspects and fields of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culture to do the research, and obtained many achievements. But on the whole, the research is still at the initial stage, thus we must explore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framework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openness of the research thinking, the change of the research angles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Key words: the early decades of new China; social changes of rural areas;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relations; social culture

关于社会变迁,不同学科对它的研究角度和侧重点不一样,在社会学意义上,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构”。^[1]从政治学层面看,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程”。^[2]从人类学观察,社会变迁是指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的改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文化变迁。而历史学研究的社会变迁,则着重点在从动态的角度“观察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演化,探寻其趋势及导引社会变革的内在因素”。^[3]不同的学科对社会变迁有着不同解释,总结起来,社会

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变化、思想文化都是其关注的问题,而研究过程和结构又是必要路径。因此,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既要从宏观上考察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又要从微观上研究经济活动的变迁、思想意识、自我认同的变化、社会风气的转变和思想文化观念的变迁等方面的内容。

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变迁,学术界围绕不同的主题、方向进行了诸多努力和探索。总体来看,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和领域。

收稿日期: 2016-03-29

作者简介: 陈益元(1966-),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李 鹏(1989-),男,河南驻马店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社会结构变迁

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上,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所造成新的社会变动成为研究的重点。土地改革,是一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变革运动,它导致了极大的社会变迁。

(一)土改运动中的乡村社会变迁

土地改革中,土改工作队下乡后,政治动员的第一步就是寻找贫雇农根子进行诉苦,以此为中心波浪式展开,以点串面,颠覆贫雇农的思想国家观念意识,形成阶级观念。诉苦,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动员和重构,进而形成国家观念的有力武器。贫雇农由诉苦到翻身,再到阶级意识的形成,这是一个逐步推展、递进的逻辑发展过程。翻了身,就会形成阶级意识,而阶级的划分,打破了既往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评判标准,给中国农村社会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土地改革,不仅仅是一场分田地的经济变革,更主要的是要掀起乡村政治的大变动。作为一种社会革命,土地改革成功地摧毁了农村中传统社会分层体制。革命后乡村的社会分层结构,已有革命前的“金字塔形”转变为一个以贫下中农和中农为主体的相对同质的“平面化结构”。土地改革是一场农民取得了土地,党取得了农民的革命性运动。从土地改革转向合作化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走向革命的必然选择。目前师吉金、陈吉元、李立志等学者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发展进程、社会现代化和社会变革、城乡二元结构等一些社会变迁的特点等问题。这些研究多是偏重于理论的分析 and 逻辑论证,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部分学者从不同时期、不同层面,展开了对社会结构变化特点的考察。

(二)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社会变迁

有学者考察了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社会动员的实现方式、途径,以及它对农村社会组织化带来的影响。学者们多认为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变革小农经济的强烈要求,它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的合作化理论和苏联的农业合作化经验。^[4]还有学者分析了统购统销制度对农村经济、组织网络的改造及其所促成的新的国家与农民关系。^[5]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一个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从政权建设的视角看,无论是初级社,还是高级社,关键是要在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组织初级社和高级社,是一场涉及农民财产并引发其政治社会地位变动的深刻社会运动。为保证合作化朝着党和政府倡导的方向发展前进,在社会动员上,新政权通过深入全面系统的思想动

员,多渠道多方式的政治动员,对农民进行宣传发动。由于合作化组织程度提高、劳动密集型作用的发挥、政策的导引以及先进技术的采用和人多做大事优势的发挥,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基本生产条件、基础设施建设上得到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这也便于党和政府推广各项农业增产措施,党和政府的权力可以借农业社经营管理渗透到经济领域。生产计划的制定、劳力组合的调配、财务管理的制度化建设,都要通过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的参与、协调和领导。经由这些途径,国家权力下移到农业社的各个环节,也使得农业社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朝着党和政府倡导的方向发展。

王瑞芳、李里峰研究了土改前后社会结构的构型和主要问题。认为随着土改后农村阶级态势的变化,农村社会结构已由“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转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农民问题实际上已由此转变为中农问题。^[6]卢晖临从社会分层结构的视角考察了土改对传统社会分层体制的摧毁,认为革命前的乡村社会史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分层结构,革命后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以贫下中农和中农为绝对主体的相对同质的平面化结构。^[7]王晓毅、何朝银从血缘、地缘的层面认为土地改革中宗族、乡村社会自我运行机制的瓦解,导致了乡村社会更加离散化,体现在社会结构上的变化是政治上的身份制、社会的组织化、农村社会独立性的丧失和血缘关系的弱化。^[8]

不同学科从不同层面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概括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但对社会结构的考察,不能仅停留在土改前后和合作化政治宏观层面的把握,还要从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更为具体的合作化时期进行全方位探究。由于中国人口多规模大的社会特点,决定了对乡村社会结构变化的考察,有必要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资源进行实地、参与式的实证研究,这样才有可能描绘出一个全面的社会变迁结构图形。

二 社会组织变迁

目前对于社会组织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权力结构、新社会权威和基层精英等方面。土地改革运动中,以往的社会文化组织网络受到了冲击,党的组织、各种群众性组织相继建构起来,农村政治精英不断涌现。通过基层组织的建构,农村社会基本机构被改变,党组织延伸到了农村基层,各乡均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组织和青年团组织。通过这种延伸到基层的组织,国家可以有效地动员和

管理农村社会,打破农村社会的封锁。每一个组织的成员都会按照组织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下级又以服从上级组织的指令为原则。土改后农村已经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农村丧失了其独立性。

王瑞芳、张一平分别从宏观、微观的不同层面,分析了土改开始后乡村政治格局的改变、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基层政权建设的情况。^[9]杨娜、卢晖临重点考察了革命前后社会分化的不同模式和特点、农村社会权威的相关问题。卢晖临认为,土改后农村成员之间确认和区分身份的过程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些贫雇农和中农两个群体间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偏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宏大社会工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杨娜指出,土改后,乡村社会原有的政治权力迅速衰落,随着新的区乡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农村社会权威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此,阶级成分如何,对新政权是否忠诚,成为新社会权威确立的标准,也是农村社会精英和平民分化的依据。^[10]

在对社会组织变迁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既要分析乡村社会权威、新权力组织和新社会精英形成的特点,也要注意考察乡村社会组织变化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困境。同时也要关注乡村政权建设的过程对社会组织变迁的影响。这样我们才能从更深的层次发现社会组织变迁的演进过程。

三 社会关系变迁

经济关系和道德权威的转变,一直是学术界所要考察的重点。在经济关系变化上,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土改和合作化时期的所有权、生产交换模式、生产自主权等等。土改后实行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际上是一种集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于一体的产权制度。土改后,土地私有和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依然得以维持,村庄的生产模式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9]土地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掀起的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了根本改版,经济秩序、社会关系得到了重组和重建。经由这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政权建构起来,党和政府的力量深入、下移到乡镇村落。经济关系的重组、政治秩序的建构造成了农村社会全面深刻转型。

(一)经济关系变化的研究

张晓玲、苏少子、张静分析了生产资料占有情况、阶层分化等方面的问题。认为土改后农村的中农化,是一种“低水平”“相对化”的中农化,农村居

民之间收入差距很小,收入大致处于平均化的状况。^[11]农村中各阶层之间生产资料占有多少的排列,与成分高低的排列基本一致。阶层间差距不是很大,生产资料大致平均化。王瑞芳、张一平等学者则考察了土地生产资料占有变化以及土地制度变动对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影响。社会变迁上,土改重塑了各阶层之间的基本关系,重建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联系。经济变迁上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制度中包涵了国家权力的意志。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生产的主要条件,即把土地和一部分主要的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但它并未解决农民所有的生产问题。土地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农村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没有导致一场经济革命,没有改变乡村社会小农经济的本质。

学术界在生产自主权方面,考察了办社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强制性做法带来的负面影响问题。他们认为,合作社推进过程中的强迫命令和入社过程中对中农利益的侵害,造成了农民对合作化产生了“吃大锅饭、合伙平产、二次土改”的认识和对生产资料“归公”的恐慌。^[12]农民是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要改造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必须关照他们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觉悟,要他们“毫不顾忌地抛弃私有财产而参加合作社”。^[13]与家庭经营制度相比,合作社除了通过劳动时间的长度来计量劳动量外,还缺乏保证劳动质量的手段。^[14]加入公社的农民失去了家庭自主权,对于做什么怎么做,都有严格的要求,自主权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的生产发展。

(二)道德权威变化的研究

在道德权威方面,学术界主要关注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及其相关问题。合作化运动和土改,极大地冲击了宗法权威、道德权威和宗教权威。家族所拥有的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宗族祠堂等建筑物被没收或毁掉,族规和族约已失去权威和约束力。阶级关系取代血缘、地缘关系,成为乡村社会新型等级秩序的根本标准,乡村中原有的亲友、邻里和身份地位等形成的关系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制于阶级关系,社会关系“一元化”取向越来越清晰。^[15]家庭虽然遭到了多次冲击,但经历多次运动并没有摧毁传统家庭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小农业和小手工业原始结合的方式。因此,它不可能导致传统家庭发生根本性变化。

以上社会关系的研究,揭示了建国初期经济关系中所有权、生产交换模式和生产自主权三个方面的变化和特点。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想全面了解建国初期的社会关系,就

要多关注物质、政策、思想、实践活动等方面的内容,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从动态和静态、过程和结果中了解社会关系的演变。

四 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变迁

(一)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

在社会变迁的研究方面,李立志、黄树民、曹锦清等学者研究了社会文化变迁的特点和过程。认为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入”,是导致社会文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16]有学者从国家权力深入单向度的考察,认为应该注意揭示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两者互动、冲突的面相和内容。有的考察了国家文化对乡土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的渗透和冲击,以及地方社区对政治运动和规划社会变迁的反应。^[17]有学者通过审视国家力量如何影响社会、社会如何回应冲击,考察了小村庄与大国家历史的形成,认为乡村社会变迁是国家权力渗透和乡村社会反应之间连续不断的互动过程。^[18]他们强调,在实践层面,必须做到以人的利益需求为根本目的,时刻要牢记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9]

新中国开始的文化变迁,是全国性文化取代乡村社区文化的历程。在社会文化变迁中,受冲击最直接、最厉害的,是民间信仰物质层面的内容,最为突出的显现,是民间信仰活动的衰落。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表现出“特殊化向普遍化、区域化向全国化、群众化向全民化”的单向流动的特点。^[20]有学者探讨了土改以及合作化时期乡村行政权威的逐步确立对村落家族和地域文化网络的冲击,以及这种替代对村落家族文化造成的影响。有学者从中共对乡村村落改造与重建的视角,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是如何逐步加强对乡村社会国家意识的培养问题。^[21]有学者从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等方面论述了革命所造成的新的农村社会变动。^[22]还有学者通过村庄微观史历程的考察,探讨了乡村集体化进程中农民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问题,认为乡村内生惯例和观念,以及外设制度和话语体系,共同决定了村民表达意愿以及与干部互动的方式。^[23]这些研究虽然是对农村社会变迁的总体研究,但是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农村社会变迁的全面认识。

学术界对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揭示了它的主要特点和内容,指出了建国前后社会文化变化的对比,以及推动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因和外因。由

于文化本身内涵复杂、不同地域文化存在差异,我们对乡村社会文化的考察,必须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要正确把握文化变迁中改造和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复杂关系,就有必要整合各学科资源进行全方位研究。

(二)社会心理变迁的研究

在社会心理变迁方面,学界主要考察了土改和合作化时期农民的心理变化以及对农民精神世界的重构。周晓红从心态史的角度,考察了土改、集体化时期江浙农村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组,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变迁。^[24]李立志等学者从宏观的层面分析了建国初期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进程和内容,认为农民社会心理经历了一个由“知足常乐”到“发家求富”、由保守到激进,以阶级意识代替家族意识,以领袖崇拜替代民间信仰的过程。^[25]

张晓玲、郭于华、李巧宁等学者揭示了合作化运动农民精神状态的变化,以及各个阶层在运动中的思想变化过程。郭于华以农业合作社时期的女性记忆为个案考察对象,认为合作化开始的宏大社会工程是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从此,女性“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领域。这种转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工具的过程”。^[26]彭正德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呈现了合作化运动中农民抵制合作化政策的心理倾向和各种消极行为。

学术界从不同层面,分析了土改和合作化时期农民精神世界的重构和各阶层的不同思想动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建国初期社会变迁的认识。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宏观层面的研究较多,我们应该把重点转移到农民个体的考察。

对乡村社会变迁的考察,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农村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对历史的考察和研究也逐渐深入。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变迁,学术界从不同学科、不同层面进行了多视角和宽领域的研究。受学科视野、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的限制,不同的学者得到结论也有所差异。总体而言,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该主题应该注意的问题,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多种研究视角,积累了大量素材。但要使研究进一步深化,还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整合。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两个类别:一个是从宏观静态层面对中央、上层政策的解读或以人物事件为中心来分析乡

村社会的变迁。另一个是从微观底层视角,以村落、乡或县城进行实证考察,分析全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复杂概况,以图避免宏大叙事的弊端。从以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关注重大事件的研究较多,对农民主体活动的考察还比较少。我们应该多采用中观的视角,以省为研究对象,这样可以克服微观叙事的片面化和宏观叙事的弊端,整合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资源进行整合性研究。以省为研究视角还可以把国家政策和基层的实际运动有效地结合起来考察,达到中央与地方的结合。

二是研究思路的开阔和研究视角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历史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社会变迁不同于民国时期国民党的社会变迁,也不同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党政合一体制。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变迁和人民公社时期的社会变迁有着某些方面的延续和扩展的关系。因此要深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就要更加注重这种过渡、转型的属性。

三是研究内容的展开。现有的研究成果虽然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进行研究,但从本质上来看,整体宏观研究的多,微观专题研究的比较少,表层静态研究的多,动态深化研究的少。我们的研究在内容上既要从宏观整体上把握政权建设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推动,又要从微观地方视角揭示两者之间的互动画面。因此,我们应从中观视角和多层面进行详细的考察分析,扩大专题性研究,这样才能认识到乡村社会变迁的演进轨迹。总之,目前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成果还不多,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 [1]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21.
- [2] 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 乡村社会变迁[M]. 王晓毅,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1.
- [3] 张静如,卞杏英.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变迁[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2.
- [4] 程晓丽. 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研究述评[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74.
- [5] 魏雪莲.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研究:以1949~1956年农业合作化为例[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2005.
- [6] 王瑞芳. 新中农的崛起: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J]. 史学月刊,2003(7):115.
- [7] 卢晖临. 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关于房屋的故事[J]. 社会学研究,2006(6):147.
- [8] 王晓毅. 血缘与地缘[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71.
- [9] 王瑞芳. 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为中心的考察[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10] 杨 娜.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农民阶级分化[J]. 中共党史研究,2005(2):36.
- [11] 苏少子,张晓玲. 新中国土改后农村阶层变化再探讨:基于测算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角度[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1):29.
- [12] 林蕴晖,顾训中. 人民公社狂想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147.
- [13] 罗平汉. 农业合作化运动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188.
- [14] 瞿 商. 新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与绩效[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4):76.
- [15] 李里峰. 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J]. 安徽史学,2008(2):75.
- [16]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 [17] 于建嵘. 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J].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38-440.
- [18] 吴 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19] 陈若松. 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诉求特征[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77.
- [20] 李立志. 1949-1956年中国社会风习的演变及其特点[J]. 教学与研究,2001(1):62.
- [21] 王沪宁.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59.
- [22] 范连生. 建国初期三农问题与乡村社会变迁(1949~1956)[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2009.
- [23] 李怀印. 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与改革的微观历程[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7-140.
- [24] 周晓红. 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25] 李立志. 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 [26] 郭于华.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驰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J]. 中国社会科学,2003(4):90.

责任编辑:黄声波